

福利制度是应对人口危机的“救命稻草”

蔡 昉

当“人口负增长”成为热搜常客，焦虑情绪在社交媒体蔓延：劳动力萎缩、养老压力激增、经济活力下降……面对这一全球性难题，中国该如何破局？

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蔡昉在一场深度对话中给出了清晰答案：建立与中国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福利社会制度，是扭转人口下滑趋势的关键钥匙。这并非简单照搬西方高福利模式，而是一场关乎制度创新与社会重构的系统工程。

一、福利国家的诞生：源于人口危机的历史启示

很多人误以为福利国家是经济发达后的“奢侈品”，但历史告诉我们，它恰恰是应对人口危机的“救命稻草”。蔡昉指出，早在20世纪30年代，瑞典就率先面临人口负增长威胁。当时主流观点仍信奉马尔萨斯理论，认为“人口多未必好”，但前瞻性经济学家预警：人口停滞将引发经济社会系统性危机。

为此，瑞典没有止步于简单的“生育补贴”，而是构建了一套覆盖“生、养、教、业、老、病、死”的全周期保障体系。从免费教育、医疗到就业支持，再到养老兜底，政府通过制度化安排分担家庭养育成本。正如蔡昉所强调：“整个福利国家的构造初衷，就是为了把出生率下跌的趋势给打出去。”这一制度创新不仅稳住了人口基本盘，更催生了现代福利国家范式，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经验。

二、破除误区：福利制度≠高福利，关键在于“可承受”

谈及中国能否复制福利模式，公众常陷入两大误区：一是认为“没钱搞不了”，二是担心“福利养懒汉”。对此，蔡昉明确驳斥：“建立福利体制并不应该和高福利划等号。”他举例指出，1930年代的瑞典人均GDP远低于今日中国，却成功启动了福利制度建设。核心逻辑在于——福利水平必须与经济发展阶段动态匹配。

“是根据你的发展阶段，能够支付就能够承受的这个度。”蔡昉的这句话点破了制度设计的精髓。中国的福利体系建设无需一步到位追求“从摇篮到坟墓”的全包式保障，而应聚焦痛点：比如扩大普惠托育服务、降低教育医疗自付比例、完善女性职业保护机制等。这些举措既能缓解家庭后顾之忧，又不会超出财政承受能力，实现“小步快跑”式的渐进改革。

三、中国路径：从“补孩子”到“保全程”的制度升级

当前我国生育支持政策多集中于一次性补贴或税收减免，效果有限。蔡昉洞察到更深层矛盾：“影响人们生育的不光是生不生，还有养不养得起、教不教得好、就业稳不稳，甚至未来生老病死有没有保障。”这意味着，零散政策难以形成合力，必须转向系统性制度重构。

政府出政策能不能扭转人口下降趋势？关键看是否构建了让年轻人敢生、愿生、能生的制度环境。这需要超越“发钱思维”，走向更高层次的制度创新。

（本文来源：聊一波财经，2026年3月23日。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）